



暨南文丛

主 编：蒋述卓
副主编：马秋枫 冀满红

【卷三】

亦僅取危而己故其山水於遊覽之類。固則舉輕就重不容置人於山巔會附以樹石映帶其地而後已觀者仲仲皆增三風會齊南早有命定冠絕一游甚堪合意而誤認成蟬蟻疑其真以子彈之其後又食昆蟲中飛窺窺之以獻佛佛更謂信於神驗以彰其德習傳之以美自名丹者若輩除却如事吐納初見甚平周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而六氣或感傷染以淡色微加點綴不求存人語須知三經一時爲說安所難貴在無害吾多言益世月卦或差違一毫許耳而他

○廿年讀書人或數筆不暇目得人間友誼當因循則格志同與志不同處境時好時正在阿堵

（照集卷一）東坡先生所謂去其繁文之弊，但存其神理之意，此固不難實得氏爲多，又嘗補集卷一上，有綠羅色，似錦綉樣於上，而長其色，即錦綉，所以爲錦綉，謂之沒骨畫，雖寸寸盡其神理，然此亦一則去其繁文，取其神理，如江山遠近，木工咫尺之間，有千里之勢，爲六朝第一，其原亦出於此，而後乃浸淺而而步，而後乃浸淺而而步，以才力三者於神理，然其可貴者，在於山水，則於子虛之文，大抵亦皆大略之而，而多步其意，此亦今時士大夫所外者，其神理則固不假乎繩墨，全賴筆端，此由神理之授，非學所能，又其不物乎神，則以神行之，其即前之所謂寸十四寸得神，遍步江山，盡其神理，目即其神，所以爲神，此後亦亦相若，而神理之不足，亦無所不有，一語而盡，雖如石湖，謝山大學所自經之句，然在松樹樹其神，其亦亦神而不爲其神，而相異，而神之於此，壯麗黃之外，其妙此也。

唐吳道子畫以氣韻

唐人李六代之餘風。賈家遺蹟。近爲精造。雖無遺物。至今千數百年。書爲後人所罕見。而偽託者甚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暨南文丛·卷三/蒋述卓主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1079-771-9

I. 暨… II. 蒋… III. ①暨南大学—文集 ②史学—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0644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85226581

营销部 (8620) 85227972 8522060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9.5

字 数: 840 千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三卷总定价: 210.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暨南文丛编委会

主 任：胡 军

副主任：蒋述卓

委 员：贾益民 陆人祥 纪宗安

王 华 叶 勤 周天鸿

刘洁生 王志伟 林如鹏

暨南学脉 山高水长

——《暨南文丛》序

蒋述卓

清末维新运动与新政中，不断有近代新式学堂创立，于是百年之后，国内的“百年老校”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一向是敬老的，而一所百年老校是否“老”，要看它的学脉是否绵厚悠长，学统是否笃实方正。如果还有大规模的老建筑以为佐证，自然更好，但对于几经播迁，几经废兴，饱经国事沧桑的暨南大学来说，这一点就很难强求了。不过暨大的百年历史上，不乏学养精深的名师大家，为暨大的学脉、学统增添了厚重的底蕴。到今天，名师们的学术成就与为师之道，已成为暨大宝贵的精神财富。套用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论述，大学在精神上的“建筑”远比它在有形物质上的建筑重要得多。这套为纪念暨南名师而编撰的《暨南文丛》，亦可看作是百年暨南在精神上的一群气象恢弘、结构精妙的“老建筑”。

仔细看来，这群“老建筑”的核心部分，“始建”于上海时期的暨南大学（1927—1949，抗战期间有4年办学于闽北建阳）。暨南大学一直与“海”有着不解之缘，是一所被海风吹拂、海水浸润的大学；暨大的校徽是蔚蓝的海水色，暨大的办学使命是“声教讫于四海”，暨大是一所首先面向南洋、因海外华人华侨而立的大学，也是一所曾受惠于上海海派文化风格的大学。所谓海派文化风格，就是不拘一格，以开放的心态跟随世界潮流。上海时期的暨大，求经问史与经世致用并举，长年教授与“钟点”教授并用，境外学生与境内学生并招，从而打造出名师荟萃、多元包容的校园环境。当时的暨大和其他大学一样，在吸纳名师方面有着良好的制度安排：人才的进出非常自由，学者们在不同大学间的兼课也非常普遍，从而暨大学生也就有幸得到许多名师亲炙薪传。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其他大学内迁而暨大坚持在租界“孤岛”办学，吸引了许多未能内迁的知名学者前来任教，这也是暨大上海时期名师荟萃的一个重要原因。

暨大的学脉、学统是由名师前辈们言教身传而支撑起来的。说到名师荟萃，这也有赖于慧眼识才、胸怀宽广的名教育家、名校长。暨南大学在上海时期达到国内一流名校的水准，拥有众多知名学者，这与当时暨南的两位名校长郑洪年、何炳松有关。

郑洪年主政上海暨大时（1927—1934）的训词，是暨南校史上充满精神魅力



的一页。训词说：“今世俗流于颓废，我暨南同学独不可颓废；习俗沦于厌世，我暨南同学独不可厌世。自今以往，绝摩登之风，去物欲之蔽，坚其意志，晬其智慧，强其体魄”，“应养成刻苦自励之精神，以为异日任重致远之准备”。郑洪年强调要把暨南办成华侨最高学府，要将“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传授给国内外的学生。为此，他把延聘名师硕学作为办学的关键，许多知名学者先后应聘来校，如夏丏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伦、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洪深、黄宾虹、孙大雨、夏衍、张君勱、沈从文、罗隆基、杨汝梅、叶渊、陈钟凡等。郑洪年还聘请众多社会名流来暨大举办讲座，这些人中有蔡元培、鲁迅、胡适、徐志摩、张竞生、章士钊、黄炎培、叶恭绰、胡愈之、陶行知、高一涵等。

1935年，曾留学美国、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长达11年的何炳松出任暨大校长（1935—1946），暨大在他任期内攀上了新的高峰，特别是在1937—1941年的上海租界“孤岛”时期，有人评论说：作为孤岛中的“文化堡垒”，当时的暨大名流学者云集，其师资力量之雄厚，讲学风气之浓厚，在百年暨南史上，无出其右。当时的暨大教授、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回忆说，何炳松“做了10多年的暨大校长，暨大的学术空气是纯洁的……学术研究的自由，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涉”。

2

上海时期的暨大，著名艺术家如潘天寿，著名作家如梁实秋、沈从文、梁遇春，著名外交家叶公超，著名政治家罗隆基等，均在暨大担任教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新月派”，也与暨大有着紧密的关联。抗战后回迁上海的暨大，仍然保持着国内名校的地位，尤其是文史学科，不少教授都是学界一流人物，如刘大杰、吴文祺、施蛰存、钱锺书、李健吾、谭其骧等。

说到暨大学脉，上海时期的辉煌，有流失他移的，如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脉；也有许多传承下来、荫及后辈的，如暨大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百年来先有上海时期诸位前贤，后有萧殷、秦牧掌舵前行，至今仍为国内一方重镇。又如暨大的历史学科，经何炳松、周谷城、沈炼之、金应熙、陈乐素、朱杰勤等名师开创性的工作，在中外关系史、宋元明清史、港澳史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暨大的经济、管理学科始于1918年开设的商科，在民国时期暨大商科拥有广泛的声誉，到今天经济、管理学科依然是暨大的强势学科。暨大的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研究始于1927年设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开我国东南亚研究、华侨研究之先河并延绵至今，涌现出刘士木、李长傅等一批治学严谨、功底深厚的学者，1963—1964年任暨大校长的学问大家陈序经教授，也在东南亚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著述。

一大批名师耕耘于前，并烛照后人，百年书香，连绵传承，这是暨大宝贵的精神财富。说到精神财富，潜心向学，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留下众多学说著述，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另一种精神财富，则是人格上的和人间关怀方面的。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



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倡导学者们应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处世风范，也是前一种精神财富产生的重要条件。惜乎在高校行政化、教育流水线化的今天，这种风范、风气正在大面积流失，在此情形下，学术大师的产生环境和生存空间都令人存疑。

一路风雨，百年沧桑，暨大具有百年曲折激荡的历史底蕴，是荣誉，也是莫大的压力。这套《暨南文丛》，既是向暨南百年历史上的名师所做的隆重致敬，也是为暨大今后的学术发展树立一面镜子。弘扬名师风范，对暨大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百年来暨南人用不懈努力所浇筑的“暨南精神”，既包含了先贤的教诲，也注入了时代的潮声，为人忠信，为学笃敬，自强不息，创新为魂，格局开放，和而不同，这是暨大从过去走到今天，从今天走向明天的精神动力。

在纪念暨南大学古籍所前所长陈乐素教授 100 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2002 年），与会者一致认为，陈乐素教授的著作“经得起时代变迁的考验，其学术价值历久而弥深”。我想这句话也可移作对本套文丛的评价。希望这套文丛不要先成为百年庆典礼品，然后就束之高阁了，先贤们对学识高标和人生境界所做的探索与诠释，苦心孤诣，山高水长，值得我们后辈如甘如醴地品味。

2006 年 7 月 14 日

目 录

暨南学脉 山高水长	蒋述卓 (1)
-----------------	---------

历史类

刘士木

华侨概观	(3)
弁 言	(3)
第一章 华侨之意义	(4)
第二章 华侨移殖之环境及动机	(5)
第三章 华侨移殖之径路	(8)
第四章 华侨移殖之中介及其辅助机关	(11)
第五章 华侨移殖之历史	(13)
第六章 华侨之分布及现势	(17)
第七章 华侨与本国之政治关系	(22)
第八章 华侨与本国之经济关系	(25)
第九章 中国政府对于华侨之保护取缔	(32)
第十章 各国对于华侨之政策	(36)
第十一章 华侨之国籍问题	(43)
刘士木主要论著	(50)

陈守实

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节选）	(56)
壹 秦以前的土地问题	(56)
貳 秦汉间土地关系的新形态——带有特征性的秦汉土地关系	(79)
陆 明清土地问题	(96)
陈守实主要论著	(111)



周予同

中国经学史讲义	(115)
上 编 导 论	(115)
第一章 研究经学史的目的与方法	(115)
第二章 经学史参考书目举要	(115)
第三章 经的定义	(121)
第四章 经的范围及领域	(123)
第五章 经学的学派	(127)
第六章 经学史的分期	(132)
中 编 经学史诸专题	(138)
第一章 孔子与墨子	(138)
第二章 孟子与荀子	(140)
第三章 董仲舒与刘歆	(141)
第四章 东汉经学	(144)
第五章 玄学与儒学	(145)
第六章 汉学与宋学	(148)
第七章 清 学	(151)
第八章 康有为与章太炎	(157)
下 编 经典研究	(158)
第一章 《易》学	(158)
第二章 《书》学与《诗》学	(162)
第三章 “三礼”学与《春秋》学	(163)
第四章 《论语》学与《孟子》学	(165)
第五章 “四书”学	(169)
第六章 《孝经》学与《尔雅》学	(171)
周予同主要论著	(174)

周谷城

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	(178)
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	(182)
评柴尔德的古史研究	(194)
中国奴隶社会论	(202)
论占封建	(206)
周谷城主要论著	(218)



李长傅

泰国华侨之发展	(222)
世界的华侨	(239)
地理学研究的新阶段——温特福噶尔氏学说之介绍	(257)
《禹贡》与古代地理学	(269)
北宋东京的繁荣——摘录于《开封历史地理》	(274)
李长傅主要论著	(283)

陈高儒

中国文化问题研究（节选）	(288)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化上的矛盾形态	(288)
第二章 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	(293)
第三章 近世两种文化与中国	(298)
第四章 中国现代文化与资本主义	(303)
第五章 中国文化史上的循环矛盾现象	(311)
第九章 中国学术思想上的方法问题	(319)
第十章 中国文化与伦理思想	(329)
第十一章 中国文化与科学	(336)
陈高儒主要论著	(341)

陈乐素

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	(344)
珠玑巷史事	(379)
陈乐素主要论著	(387)

沈炼之

法国革命史讲话	(391)
第一章 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	(391)
第二章 反对“旧制度”的新思想	(395)
第三章 法国革命的导火线——财政问题	(399)
第四章 1789年的三级会议	(403)
第五章 七月十四日	(407)
第六章 《人权宣言》	(411)
第七章 欧洲君主的干涉	(416)
第八章 第一次共和	(419)



第九章 恐怖时代	(423)
第十章 新十一月九日事变	(428)
沈炼之主要论著	(431)

陆钦墀

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始末	(440)
1858 年和 1860 年东北边界的改变	(473)
陆钦墀主要论著	(487)

谭其骧

秦郡新考	(489)
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	(497)
云梦与云梦泽	(515)
唐代羁縻州述论	(528)
谭其骧主要论著	(542)

朱杰勤

十九世纪中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	(547)
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564)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	(575)
十七、十八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相互影响	(593)
英国第一次使团来华的目的和要求	(607)
朱杰勤主要论著	(615)

后 记	(620)
-----------	-------

刘士木

刘士木 (Liu Shih Moh, 1889—1952), 原名志权, 字更生, 别号黑水村人。1889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从小就受到家乡诗人黄遵宪爱国思想的熏陶, 14岁时就读于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后到南洋, 在望加锡(今印度尼西亚乌戎潘当)华侨学校任教, 后转到雅加达的《华锋报》工作。辛亥革命前两年, 经汪凤翔介绍, 刘士木到棉兰任华商小学校长, 不久又在民礼创办并执掌中华小学。在此期间, 经同盟会员谢芋蛋等介绍加入日里的同盟会支部, 积极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当时孙中山曾派胡汉民到日里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并准备在檳城筹办《光华日报》, 刘士木积极为该报招股筹款, 并通过《光华日报》宣传革命形势和革命精神。由于他表现突出, 1912年, 被推举为代表日里各埠书报社回沪参加吴世荣、陈楚楠、谢碧田诸公组织的“革命联合会”, 向北京政府请求参政权。

由于长期生活在南洋, 并在广东侨胞中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 使他认识到南洋与祖国命运密切相关, 尤其是华侨对国民革命的贡献, 更促使他对华侨的关注和热爱。他常对朋友说:“孙总理常称南洋华侨为革命之母, 所以我们应当格外安慰侨胞和报答他们。”因此, 他后来赴日留学, 选择了设有南洋研究的日本大学经济系。1926年学成归国, 担任国民党海外部秘书。

1927年9月5日, 暨南学校改组为暨南大学。9月21日,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宣告成立, 与大学部、中学部三足鼎立, 是暨南大学组织构成的三大支柱之一, 郑洪年、刘士木等十二人联名发表成立宣言。1928年2月, 南洋文化事业部设文化、教育两股, 刘士木任文化股主任, 办理促进南洋华侨文化事宜。当年10月, 部务会议决定, 按照实际工作需要改为部主任制, 设部主任总揽部务, 并计划和执行本部事务, 由郑洪年聘请刘士木担任部主任。1930年9月, 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改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刘士木仍为主任。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之役, 暨南大学遭重创, 该部历年悉心积累的大量资料惨遭损坏。刘士木本人“或搜自外国, 或得之南洋”的“海内孤籍或宋槧善本”, “尽付祖龙一炬”(《申报》1932年6月6日), 殊为痛惜。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被迫随校本部迁往上海租界, 奉命改设为南洋研究委员会。刘士木、陈希文、魏振华任常委, 主持会务。是年9月, 学校迁回原址复办, 恢复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撤销南洋研究委员会, 刘士木、陈希文任正副主席委员, 兼任调查股和编辑股主任。1934年, 沈鹏飞代理校长, 改聘丘汉平、俞君适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正副主任。1935年6月, 何炳松担任校长, 聘吴泽霖、俞君适为该部正副主任, 聘请刘士木、温雄飞、陈达等11人为组织评议会评议员。

刘士木在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工作期间, 广罗人才, 大力开展各项服务华侨和



促进南洋研究以及加强中南文化交流的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李长傅、温雄飞、丘汉平、俞君适、钱鹤等一批治学严谨、功底深厚的华侨问题研究专家聚集到该部，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风气，培养了一批华侨问题研究人才。根据该部成立的宣言和宗旨，他们分工协作，同心协力，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刘士木在担任主任的五六年间，除了总揽部务、统摄全局外，还直接负责编译出版等具体工作，身体力行，如创办了《南洋研究》、《南洋情报》（后改称《中南情报》）等刊物，及时报道了华侨动态和有关研究成果。刘士木亲自主编的《南洋研究》是当时中国学者研究华侨问题最早的唯一学术刊物，主要撰稿人刘士木、李长傅、温雄飞、俞君适、钱鹤、顾因明、陈宗山等，均是当年南洋问题研究的著名专家。该部还出版了一套与华侨问题密切相关的《南洋丛书》（后改称《海外丛书》）40余种和其他与华侨研究有关的著作，其中有8种是刘士木撰写或刘士木与他人合编的专著，内容涉及东南亚各地教育、经济和商业法律等，都是引人注目的南洋问题研究专著，反映了当时暨南大学南洋和华人华侨研究领域的卓越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为事业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我国的南洋研究和华侨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2 1929年6月6日至12日，刘士木在暨南大学组织召开中国首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到会的有华侨教育专家、南洋各地教育工作者及各方面代表78人，共收提案261件，内容涉及华侨教育的宗旨、方针、教材、经费、师资、管理制度等许多重要问题。会后，刘士木等人收集会议论文编纂《华侨教育论文集》。此次会议是中国华侨教育史上第一次重大盛会，有力地推动了华侨教育和华侨研究的发展。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刘士木隐居马来亚檳城黑水村，继续从事南洋研究工作，其间任钟灵中学图书馆主任，积极收藏东南亚资料，著述甚丰。1940年3月17日，刘士木与姚楠、李长傅、张礼千、许云樵、郁达夫、关楚璞等七人在新加坡假南天酒楼创办“南洋学会”，并组成首届理事会，刘士木任理事，后担任多届理事及五届会长（1948—1952），致力于南洋研究和发扬南洋文化艺术。

刘士木在南洋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士木时代”是中国学者南洋研究的四个时代之一，四个时代分别是何海鸣时代、刘士木时代、尚志学会时代、南洋学会时代。在刘士木时代“已能作整本专书的编译，并充分利用日文资料……同时，他鼓励中国学者南进，执教或办报，以精神文化给养南洋华侨社会”，比前一时代更进一步。（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见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

1952年10月1日，刘士木在檳城不幸逝世。新加坡暨南大学校友会、客属总会、应和会馆及各学校团体于当晚在中国语文学校举行追悼大会，众多文化界人士出席。南洋学会敬送的挽联是：“论事业，论文章，一生南洋研究，开源导流共推



秦斗；是学者，是名士，十年北马隐居，安贫乐道不愧完人。”南洋学会理事会会议决对已故会长做出三项永久纪念办法：①在《南洋学报》八卷二辑编印纪念特辑；②筹募纪念基金以奖励南洋研究；③赞助并鼓吹“檳城文库”的成立。

刘士木从事南洋研究四十余载，苦心钻研，辛勤浇灌，笔耕不辍，著译宏富，为发展华侨事业和密切中国与南洋的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成就了中国华侨研究和南洋研究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无愧于中国东南亚研究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也无愧于当代东南亚研究的一代宗师。

华侨概观

弁言

关于华侨问题，虽不乏专书之记载，然从事有系统之研究者殊鲜。本书虽限于篇幅，未能发挥尽致，然对于华侨整个问题，业已旁搜博引，务期大体无所遗漏。故在叙述华侨之分布现势以前，对于华侨移殖之环境及动机，华侨移殖之径路，华侨移殖之中介及其补助机关，华侨移殖之历史，先为叙述，以明我华侨在世界各地之所以能有今日之地位，皆我华侨之冒险精神，勤劳习惯经营天才，与夫战胜环境之坚苦卓绝精神所致，并非出于偶然，侥幸而得也。然外人鉴于我华侨之成功，因羨生妒，各居留地政府，因经济之关系，种族之偏见，遂一变前此之欢迎态度，特订苛例，藉资排斥，以制华侨之死命，使之不能发展。比年以来，因世界经济发生恐慌，此种险象，弥漫全球，苟非及时交涉，速谋救济，则我旅居海外之华侨，恐将沦胥以亡，万劫不复矣。至于华侨对于祖国，无论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均有莫大之贡献。就政治言：华侨对于历次革命，均有殊勋，其功殊不可湮没。就经济言：往昔世界经济状况良好时，华侨每岁输入中国国内之现金，南洋华侨达二亿元，美洲华侨达五千万，我国对外贸易，历来入超甚巨，然在国际借贷上，尚能勉强保持平衡，国民经济所以未即破产者，胥赖华侨输入之现金，以资抵偿也。故本书对于叙述华侨与中国之政治关系，及华侨与中国之经济关系，不厌求详，藉以明华侨对祖国之政治经济，有莫大深切之关系。此外中国政府对于华侨之政策，代有变迁，自清朝末叶以降，深知华侨与祖国，有利害切肤之关系，渐能讲求保护之政策；民国成立以后，因历次革命，华侨均有贡献，且因民族自觉思想勃兴，故对华侨之政策，益趋积极，然因内忧外患，交相侵逼，国际间之不平等条约，与夫居留地政府不平等之法令，迄未能废除，今后唯有全国一致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庶几化险为夷，一洗今日被人苛待之羞耳。至于各国之对待华侨政策，亦有研究之必要；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故欲谋华侨待遇之改善，与夫居留地政府对华侨不平等法令之废除，自有研究其政策之必要也。此外尚有华侨之国籍问题，关系华



侨之身份地位，及其权利义务，且在外交上常引起国际间之纠纷，故华侨之国籍问题，亦不容忽视者也。

本书属稿时间短暂，舛误在所难免，尚望海内外明达指正，不胜感谢。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一日编者附志

第一章 华侨之意义

第一节 华侨在文字上之意义

华侨者，乃我中华侨民之简称也。华者，乃自我国人古来对于自己本国之美称的中华而来者也。侨者，乃侨居之略语，表示一时居留之意。故华侨云者，即我中国人之一时居留在国外者也。

第二节 华侨在本质上之意义

华侨之意义，自其在本质上之内容言之，则决非如前节所述就文字解释之简单者也。关于华侨在本质上之意义，虽尚未有明确之定说，兹姑假定如下：

4

“华侨云者，系由移殖当时为中国之领土地域而移殖于外国领土之中国人或其子孙之居留于外国领土者也，但其国籍之如何，则在所不问也。”以下更就上述定义之内容说明之：

一、移殖当时为中国之领土

领土云者，非已割让，或租借于外国之地域之谓也。故台湾自割让于日本后，该岛居民，多变为日籍，嗣后移殖外国之台籍华人，或其子孙之居留于外国领土者，在事实上姑置勿论，就本质上言之，固不得称为华侨也。

二、须移殖于外国之领土

在一八四二年香港未割让于英国以前继续居住香港之中国人，就本质上言，虽不能谓为华侨，反之是年以后由中国领土移居香港之华人，则属于华侨之范围者也。

三、包含子孙在内

此为前节在文字解释上难以说明之点，事实上现在南洋与北美及其他各地之华侨，当初移居者之子孙颇多。

四、不问国籍之如何

本来现实由中国移殖之华侨，就其身份与地位而言，固属简单，然在外国领土出生之中国人子孙，而居留于外国，或居住于中国者之身份，关于国籍之当地出生之该国法规与中国法规，互相扞格时，颇多发生复杂之问题。所谓二重国籍问题，就法理上之见地言之，虽无可资研究之处，然当决定华侨之定义并非为必不可缺之要件，故暂置勿论焉。



第三节 华侨在事实上之意义

华侨在文字上及本质上之意义，既如上述，然在事实上当研究华侨问题时，尚有先决之二要件也。即前节所述之须移殖于外国之领土，严密言之，曾为中国领土之地域，割让或租借于外国时，向来在该地域继续居住者；以及该地域割让或租借于外国以后，由中国领土往该地域移殖而继续居住者，虽不可不明确以区别之，然在事实上则殊属不可能者也。故就实际上而言，当比较前述二者之数，后者（即华侨）比前者为数非常之多时，则在该地域之前者，在便宜上含使之包含在华侨之外，实无其他方法，此因统计上之不完备，与夫实际调查上所生之困难，系属不得已之处置也。

其次之应决定者，为华侨居住本国之时，任本国出生之华侨，回本国时，当然为中国之国民，固不待言，反之，在外国领土出生之华侨，如回中国国内时，将生如何之问题耶？此时若依据中国国籍法，当然应为中国国民，然在事实上，依然视为华侨，较为便宜也。此种论调，虽甚感不彻底，然试一考察华侨之国籍及其他问题，姑采此种解释，实亦不得已也。

第二章 华侨移殖之环境及动机

5

第一节 人口之分配不均

关于中国人口之调查统计，在中国历史上可稽者，当推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敷布新政，行青苗保甲之法为滥觞，然当时之人口概数，颇属不实不尽，且其地域，亦仅限于京兆附近之小区域而已。明末清初之季，有谓中国人口已超过一亿五千万者。要之，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崇拜祖先，家族制度组织坚固，故古来人口密集之倾向颇著。

降及近代，中国之人口统计，在光绪年间（一八八五年）中国本部三亿七千七百六十三万六千人，宣统年间（一九一〇年）三亿三千一百十八万八千人，近年中国各海关之管内人口统计，达四亿四千四百六十五万三千人，民国十五年据邮政总局各省人口之调查，达四亿三千六百零九万四千九百五十三人，又据民国二十三年《申报年鉴》试编之人口数，则为四亿七千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三百三十五人。

各省之人口比较稠密者，则为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福建、广东诸省，就中江苏、山东、安徽三省，占长江并黄河流域平野地带面积之全部或大部，浙江山地虽多，然因气候温暖，地味肥沃，丘陵之地，几全部夷为耕地，可与江苏、山东、安徽三省相埒。反之，福建、广东二省，南岭山脉，纵横绵亘，虽有闽江、西江两流域错杂其间，然其地质大都属于石灰质系，与江苏、山东、安徽、浙江诸省之沃野千里，实不可同日而语。故试以耕地与人口为比例而推算，则福建、广东两省之人口密度，当超过上述之四省也。



第二节 生活环境之困苦

中国因人口之稠密，一般人民之生活维艰，自属意中之事。自后稷教民稼穡，夏禹治水而后，历数千年以迄于今日，耕作已达集约之极点，人民生活，自不得不趋于消极与节约。据民国十年中国济生会之调查，假定农民五口之家，每年收入为百五十元，则未达此标准者，江苏、浙江二省，占百分之五六十，河北、山东二省，则超过百分之八十，上述各省，地味素称肥沃，农民生活状况，既如是艰窘，而福建、广东二省，耕地狭小，人口稠密，每年粮食不能不仰给于暹罗米、安南米之输入，农民生活状况之艰窘可想见矣。

更就都市劳工生活观之，民国十二年据北平清华学校学生所调查之各种工人之百四十一人之生活状况，有一百十七人之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为六元至九元五角，其每月平均生活费，则为五元二角九分，上述之工人生活费，房租一项，尚未列入，故实际之生活费，当不止此数，结果其收入或尚不充足生活费用，亦未可知。又据朱懋澄氏所调查之上海普通工人之生活，一家五口，每月生活费需二十一元三角四分，而上海大工厂普通工人之每日工资平均大洋五角，每月收入不过十五元，其生活之困窘，不待言而可知矣。

6 第三节 我国人民之国内移居与海外移殖

中国人口之稠密与人民生活之艰窘，既如上述，此外尚有人为的战乱，或饥馑、洪水、疫病等不可抗之力，所加受之灾祸，其困苦更有不可胜言者。就战乱言，秦白起坑赵卒四十余万人，王莽之败，伏尸百万，就天灾言，禹有十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此史实斑斑可考者也。就疫病言，相传魏建安有大疫，死者如麻。近世洪、杨之乱，波及中国全土，民国成立以还，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人民之颠连困苦可谓甚矣。

中国人民，历受天灾人祸，如此其极，虽自古以来，受祖先崇拜家族主义之儒家思想之影响，安土重迁之观念，牢不可破，然为求生存起见，不能不为流民而移徙，山东、河北之人民，尝渐次北进匈奴所割据之边境，清朝以后，则多移居东三省。

上述中国北部之人民，虽有移居东北满、蒙等边疆各地之便利，然南部福建、广东、广西诸省之人民，地理上固未具备有国内移居便利之条件，自明末以来，变乱频仍，迄无宁岁，人民所受之痛苦，至为深刻。人民为求生存起见，不惜冒犯海禁，秘密移殖海外，降及清代，自三藩乱后，秘密移殖菲律宾、安南、暹罗、爪哇、婆罗洲各地者，日见增加。

第四节 华侨移殖之动机

福建、广东、广西诸省之人民，为求生存而冒犯海禁，秘密移殖海外，已如上述，此等移民，自十九世纪以来，大为激增，大势至此，决非政府之一纸禁令所能阻遏，故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满清政府亦不能不开海禁焉。于是各地人民移殖海